

《師大臺灣史學報》
第6期 頁53-100
2013年12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

大正民主與臺灣留日學生*

陳翠蓮**

摘要

一般認為1920年代臺灣興起近代政治運動，是受到大正民主風潮的影響。但是，何謂「大正民主」？大正時期有何重要思潮？又如何影響臺灣的反殖民運動？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卻很少。

本文梳理大正民主時期的各種思想流派後發現，當時的主流思潮是折衷的自由主義、有限的民主主義，妥協於日本帝國架構與天皇體制，強力批判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政策被視為過於激進。這些被稱為右派的保守派人士關心殖民地問題，要求改善殖民地統治，使之永遠為帝國領土。相反的，社會主義者因為錯誤的判斷，以為俄國革命成功、日本群眾運動興起，認為實現階級革命即將實現，因此，對殖民地問題並不關心。在此情況下，臺灣留學生較接近右派的自由主義者，並且從中取得思想資源。

同時，大正民主時期日本言論界批判殖民壓迫，關切的焦點是朝鮮、滿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補助 NSC98-2410-H-004-140 部份成果。本文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8月23-24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第一會議室。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出建議。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洲、中國，臺灣問題極少受到關注。臺灣留學生的回應戰略是，儘可能擴大聯合對象，左派走國際主義路線，與日本、朝鮮、菲律賓、印度等亞洲各國人士互動，更與朝鮮、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攜手組織團體；右派也與朝鮮人合作辦刊物、相互聲援。20年代反殖民運動中的跨國合作情形，超乎想像，值得進一步研究。

關鍵詞：大正民主、臺灣留日學生、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一、前言

1920年代臺灣興起近代政治運動，一般的說法都指出是受到大正民主風潮的影響。但是，何謂「大正民主」？大正時期有何思想風潮？又如何影響殖民地臺灣的政治運動？這是筆者長期以來感到疑惑的問題。以往研究日治時期政治運動，重點都置於運動本身，如同化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等等，著重在各項運動的來龍去脈與影響。國內歷來研究對於大正民主與臺灣政治運動的關係，探討十分有限。¹

京都大學山室信一教授指出，自明治維新成功以後，日本成為亞洲各國取法的對象，紛紛前來留學、取經，學習西方近代知識、軍事、典章、制度與思想，以日本為中心形成知識交流傳播的網絡。²對照臺灣的狀況，殖民地臺灣的留學生也在大正時期大幅增加，並且成為臺灣近代政治運動的起點。臺灣留學生所處的大正民主時期究竟是個怎麼樣的時代？筆者認為有必要再加探究。探討臺灣留學生思想與時代環境的關係，將臺灣的政治運動置於日本帝國與時代思潮架構下加以檢視，是本文的第一個目的。

其次，筆者曾於多年前梳理過20年代自治主義路線政治運動的訴求與理論，³但是對於臺灣留學生們提出這些主張的依據為何？更明確的說，其思想資源、或是如山室信一所說的「知識的回路」從何而來？一直未加以解答。甚至，對於蔡培火、林呈祿等自治主義、臺灣議會運動主張者，其思想上與人脈上傾向保守，頗感到不解。大正民主時期日本帝國本土，殖民統治問題如何被討論？哪些人士關心、探討殖民地統治問題？又如何

¹ 國內相關研究，據筆者所知有兩篇碩士論文，分別是長田正民，〈大正民主潮流與臺灣：石橋湛山、吉野作造、田川大吉郎〉，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潘柏均，〈大正民主思潮與日治時期的臺灣政治運動—以泉哲及田川大吉郎為中心〉，輔仁大學日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此兩篇碩論以個別人物為研究焦點，並非探討大正民主思潮的主要面貌。

²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3）。

³ 陳翠蓮，〈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18（2003.06），頁141-170。

影響臺灣留學生？這是本文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再者，大正期的東京作為知識傳播中心，吸引亞洲各國、殖民地青年前來朝聖取經之餘，也提供了反帝國、反殖民人士經驗交換與組織集結的機會。臺灣留學生如何與東亞各國、殖民地青年連結、合作？這是本文要討論的第三個問題。

二、所謂「大正民主」

一般而言，「大正民主」有兩層意義：其一，著重當時的政治型態的變化，例如民主運動興起、政黨內閣制確立等等。其二，強調一種時代精神，即對於國家價值與國家至上主義的挑戰、民間社會自立化的傾向。例如政治上，相對於國家理性、要求國民情感的自立化；經濟上，強調國家控制極小化、資本自立化；學術上，追求教養主義與大學自治；教育上，批判國家形式主義、一致主義的教育，推動自主性、創造性的自由教育運動。⁴

有關大正民主的研究，始於1950年代日本學界，1960年代為研究高峰。1950年代信夫清三郎提出了「大正民主史」的說法，成為日本學界共通的用語，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⁵大體而言，日本學界也從前述兩個方向掌握大正民主。一部分研究者認為大正民主與政黨政治發展密切相關，三谷太一郎是此觀點的代表人物，他定義大正民主為1905年日俄戰爭講和條約爆發民眾反對運動起、到1926年三個合法的無產政黨成立的20年間，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其具體意義即普選制度建立與政治體制政黨化。⁶其他如岡義武夫、松本三之介等人，也都注重護憲運動與政黨內閣制的形成。

另一部份研究者強調大正民主期的思潮、文化與民眾運動的關連。如京都大學教授松尾尊兌就認為大正民主是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到1925年護憲三

4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頁7-9。

5 江口圭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學生社，1976）。

6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頁9-10。

派進行各種改革的20年間，日本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所顯現民主主義化的傾向，並因此出現廣泛的民眾政治、以獲得市民自由為目標的各種運動。⁷ 松尾的研究焦點特別關注於大正時期知識份子，如吉野作造、石橋湛山等人與民主思潮、民眾運動間的關連。

針對上述這兩種研究取向，太田雅夫認為，三谷的定義限於政治上的意涵，探討政治民主化過程，是狹義的大正民主。松尾的定義洞察社會生活與民眾運動實態，是廣義的大正民主。包括太田雅夫、金原左門、生松敬三等人也多偏重大正民主與思想文化、社會運動的面向。⁸

其次，大正民主期的期間如何界定？儘管也有學者以大正天皇登基的1912年起，到1926年昭和天皇繼位的14年期間稱之，⁹但多數大正民主的研究者以1905年到1925年的20年間，視為大正民主期。¹⁰為何大正民主期並非自大正元年1912起，卻從明治38年（1905）起算？

日本學界認為，1905年9月東京爆發了「日比谷燒打事件」。日俄戰爭結束，民眾不滿在美國樸資茅斯簽定的講和條約，聚集在日比谷公園召開國民會議，參與的民眾包括中小工商業主、基層職工等各階級，之後演成暴動，攻擊內務大臣官邸、燒燬支持講和的《國民新聞》社，騷亂四處蔓延，兩百多個警察派出所、十多個教會、數十輛電車被攻擊焚燒，東京陷入無政府狀態，最後政府下令戒嚴、出動軍警才平息。這是民眾標榜「國民」的身份參與集會運動，挑戰舊結構與舊秩序的開始；¹¹也是都市民眾第一次以示威方式向專制政府表達不滿，蘊涵都市民眾對政治民主化的期待，間接促成明治時

7 轉引自榮澤幸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政治思想》（東京：研文出版，1981），頁5。松尾尊允，《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岩波書店，1974），頁v。

8 太田雅夫，《增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東京：新泉社，1990）。金原左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社會的形成》（東京：青木書店，1967）。生松敬三，《大正期の思想と文化》（東京：青木書店，1971）。

9 坂野潤治著、鍾淑敏譯，《近代日本政治史》（台北：五南，2008），頁134。

10 例如三谷太郎以1905-1926為大正民主期，松尾尊允認為是1905-1925年期間，太田雅夫也認為是1905-1925年期間。參三谷太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頁9-10。松尾尊允，《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v。太田雅夫，《增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頁9。

11 成田龍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岩波書店，2010），頁1-17。

期第一位非薩長藩閥出身的西園寺公望出任內閣首相，因此1905年被學界定義為大正民主的起點。¹²

松尾尊兌將大正民主運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05-1913，第二階段是1914-1918，第三階段是1919-1925。¹³ 從社會運動史或民眾史的角度來看，1913、1918、1925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年份，因此成為分期的時點。¹⁴

1913年發生第一次護憲運動，原因在於前述公卿首相西園寺公望受到陸軍杯葛黯然下台，繼任者是擔任過兩任首相、長洲閥出身的桂太郎。桂太郎組閣引起輿論大嘩，質疑西園被陸軍倒閣乃桂太郎背後一手主導。桂太郎組閣的前三天，擁護憲政大會在東京召開，群眾運動日益擴大，政友會的尾崎行雄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十日間演說會與國民會議連日召開，每次都有數以萬計的民眾參加，逐漸凝聚成「擁護憲法、打倒藩閥」的浪潮，為首的尾崎行雄被稱為「憲政之神」。眾議會為審議不信任案而召開，遭到數萬群眾包圍，桂太郎下令休會三日，憤怒的群眾從國會議事堂週邊向日比谷公園擴散，沿途對政府系的報社投石、放火，76處警察派出所被攻擊燒燬，在強大的群眾壓力下，桂太郎匆匆下台。¹⁵ 群眾運動的威力、國民的壓力已強大到足

¹² 黃自進，《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18-20。

¹³ 轉引榮澤幸二，頁5。另外，太田雅夫將大正民主運動分為三階段，分別是第一階段1905年反對講和運動到1914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階段1914年世界大戰到1920年普選運動最高潮；第三階段1920年普選運動分裂到1925年禁止農民勞動黨結成。參太田雅夫，《增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頁9。太田雅夫的三個分期與松尾尊兌相當接近，但時間點上稍有出入，由於分期時間點的原因並不明確，故本文未加採用。

¹⁴ 學者黃自進也接受松尾尊兌對大正民主的分期，並解釋1913、1918、1925為何是大正民主分期的時點。他認為1913年大正政變，其意義在於，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有在野黨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倒閣成功；且天皇支持的桂太郎下台，顯示皇室力量減弱，政黨影響力提升，必須有議會多數黨的支持方能組閣。1918年原敬內閣上台，他是日本憲政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又是首位擁有眾議員身份第一大黨黨魁，他的組閣具有開啟政黨政治的象徵意義。1925年加藤高明組成聯合內閣，確立了政黨內閣制，此後到1932年日本內閣均由兩大黨總裁擔任。參黃自進，《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頁20-24。

但，黃自進採取松尾尊兌重視群眾運動的角度進行分期方式，卻從三谷太一郎的政黨政治角度詮釋這三個分期時點在大正民主期的重要意義。筆者認為如果依據松尾尊兌重視群眾運動、思潮變化的研究取向，應該如松尾所說明這幾個分期時點在群眾運動或思想運動上的意義，似乎會更接近原意。

¹⁵ 坂野潤治著、鍾淑敏譯，《近代日本政治史》，頁130-138。

以迫使內閣倒台，這是第一次護憲運動的意義。

1918年，因米價上漲、平民生活困難，日本各地發生「米騷動」，8月從富山縣漁村開始，蔓延全國22個府縣、88個地方。米騷動是漁民自發的行動，卻席捲全國，包括農民、市民、學生、工人、受薪者等各階層都動員起來，顯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現實生活困難問題的嚴重性，成為社會變革的導火線。米騷動也成為思想運動得以展開的動力之一，使日本政治史進入新的時期。長州閥出身的寺內正毅內閣因此倒台，政友會總裁原敬組閣，原敬是日本憲政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又是首位擁有眾議員身份第一大黨黨魁，他的組閣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¹⁶

1925年則是日本通過普選法，實施普選的開始。1923年長州閥清浦奎吾出任首相，藩閥政治重返，清浦無視於眾議院各政黨，組織了貴族院內閣，表現出藐視議會的悍然作風，引起眾議院各政黨的同仇敵愾，發起「剿滅貴族政治」的第二次護憲運動。政友會、憲政會、革新俱樂部成立的護憲三派聯合陣線，清浦首相解散議會，並指控護憲三派對付貴族內閣是「煽動階級鬥爭」。重新選舉的結果，護憲三派獲得絕對勝利，由第一大黨憲友會總裁加藤高明為首組成聯合內閣，確立了政黨內閣制。1925年3月國會通過了普選法，25歲以上具選舉權的男子從328萬人驟增到1240萬人，擴大民意政治的基礎。¹⁷

1905年日俄戰爭勝利意味著日本帝國的確立，但另一方面國內資本主義急遽發展造成貧富差距、社會不安；一次大戰後，面對國際社會排日、國內階級緊張加劇，對於如何改造日本社會，各種主張日益分化對立、激化，左派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中間的自由主義、民本主義，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各自盛行。大致而言，大正民主期第一個階段以護憲運動為主，主流思想為立憲主義、憲政主義；第二階段強調民本主義、自由主義，第三階

¹⁶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第四卷》（台北：桂冠，1994），頁124-128。

¹⁷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第四卷》，頁202-205。成田龍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190-193。

段則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等各種主張並存，呈現思想激化與對立情形。

進一步而言，第一階段主要的重要理論家如浮田和民、高田早苗、島田三郎、尾崎行雄等都市知識份子或政治人物，倡議打破藩閥特權、擁護憲政，有著明顯的「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傾向。第二階段以吉野作造、大山郁夫為主，受一次大戰結束後世界思潮的影響，知識分子漸漸脫離中產階級、政黨的從屬角色，信仰近代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具有自主獨立發言與行動的特性。¹⁸ 知識份子們並組成社會運動啟蒙團體「黎明會」，學生運動團體東京大學「新人會」、早稻田大學「民人同盟會」等，少壯政治家也組成「改造同盟」，推動社會改造。¹⁹ 到了第三階段，不只民本主義盛行，社會主義為主的社會改造論更是聲勢驚人，與之對抗的法西斯主義也有一定勢力，逐漸形成大山郁夫、河上肇等社會主義路線，室伏高信、中野正剛、北一輝等法西斯化路線，及吉野作造、石橋湛山的民主路線等數種主張分化的狀態。²⁰ 尤其，1923年東京大震災之後社會不安，各種主張各行其是，更出現馬克斯主義/社會主義、國粹主義、民本主義三大主張鼎立的狀態。²¹

一次大戰後，因俄國革命成功衝擊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四散的明治時期日本社會主義者又開始活躍，1920年新、舊社會主義者糾合組織「日本社會主義同盟」，以堺利彥為中心，號召約3000人加入，12月舉行創立大會，旋即被日本政府命令解散。²² 1922年，受到普選運動的刺激，山川均發表了「方向轉換論」，社會主義運動從原本菁英化、理論化的特性，加速走向大眾化、實際化的參政運動。1920年代以後，大約大正民主第三期，社會主義運動更加壯大，受到吉野作造、大山郁夫等人啟蒙的學生團體新人會、建設者

18 太田雅夫，《增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頁 10-12。

19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頁 30-34。

20 榮澤幸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政治思想》，頁 10。

21 成田龍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 237-238。

22 川口武彦，《日本マルクス主義の源流—堺利彦と山川均》（東京：ありえず書房，1983），頁 244-247。

同盟成員愈來愈受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吸引，團體愈發左傾。此時，無產政黨相繼成立運動局面逐漸走向三谷太一郎所說的「無產政黨運動期」。²³

以下，筆者將大正民主的主流思想、代表人物等分三個階段整理如下：

表一、大正民主思想分期

期別	時間	主流思想	主導者	代表人物	主要團體	主張
第一期	1905-1913	立憲主義	政治家	浮田和民 高田早苗 島田三郎 尾崎行雄等		對內立憲主義 對外帝國主義
第二期	1914-1918	民本主義	都市知識人	吉野作造 大山郁夫 石橋湛山等	黎明會	對內民本主義 對外和平主義
第三期	1919-1925	社會主義 /法西斯主義 /民本主義三者並存	急進知識人	山川均 北一輝等 吉野作造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 猶存社 東大新人會	價值分化 左右對立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三、大正民主與殖民地問題

自從明治維新成功以來，日本作為一個新興帝國主義國家，對內強調國家主義與集體效忠；對外主張膨脹政策、擴張殖民地。而整個大正民主時期的各種思想主張與爭論，正是環繞著批判日本帝國主義而展開。大正民主運動不只關係到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的民主而已，有關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殖民地統治等課題也在此時受到重視。

日本學者榮澤幸二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與天皇制思想，由幾個面向的

²³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頁 36-40。

意識形態所構成：1、擁護國家體制與獨佔資本的同時，為確保人民各階層的服從、壓制反帝國主義運動並將之正當化的意識形態；2、將對外侵略與殖民地支配正當化的意識形態；3、為解決帝國主義各國間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4、擁護帝國主義體制、否定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並且，他也特別注意到，大正民主運動是日俄戰爭後到大正末期，針對日本帝國主義思想與民主主義思想間的矛盾所展開的運動，與朝鮮、臺灣等日本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密不可分。²⁴

1919年朝鮮三一獨立事件爆發之前，日本國內的新聞媒體甚少報導或討論殖民地問題，而是比較關心中國問題。根據松尾尊兌的統計，擁有第一發行情、批判藩閥官僚政治色彩強烈的《大阪朝日新聞》，在1913-1918年間，以朝鮮問題與中國問題為主題的社論，數量甚為懸殊。論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朝鮮是日本的殖民地，命運已定，已經沒什麼好討論的；中國問題不同，它是日本正在面對或將要解決的問題。²⁵

表二、1913-1918《大阪朝日新聞》以朝鮮問題、中國問題社論統計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總計
朝鮮問題	2	0	1	2	0	1	6
中國問題	41	29	63	74	85	31	323

資料來源：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岩波書店，1974），頁278。

朝鮮、滿洲、中國，是日本輿論界探討日本帝國主義擴張與殖民地統治時的主要對象；作為日本最早的殖民地，臺灣問題卻很少被提及。韓國學者姜東鎮研究日本輿論界與朝鮮問題，搜集了大量的報紙社論、雜誌評論，²⁶筆

²⁴ 榮澤幸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政治思想》，頁4-6。

²⁵ 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278。

²⁶ 姜東鎮，《日本言論界と朝鮮》（東京：法政大學出版社，1984）。

者特別留意大正民主時期日本言論界對臺灣統治的看法，卻發現殖民地臺灣往往是在討論朝鮮問題時被附帶一提。

以下，筆者藉著日本輿論界對朝鮮問題的討論，或附帶提到臺灣統治問題，梳理出大正民主時期思想家對殖民地統治與殖民地政策主要的幾種看法。

（一）帝國主義/亞洲主義者的看法

三一運動以前，日本媒體關於殖民地問題的討論較少，主要是大學教授、政治人物、報社記者。例如浮田和民雖被視為自由主義者、立憲主義者，但卻支持朝鮮殖民地化，只是要求基於確保遠東和平、增進朝鮮人幸福的原則下進行即可，被稱為「倫理的帝國主義」。永井柳太郎從殖民地政策的角度，反對英國自由主義式的拓殖事業，提示應強化滿洲鐵道與朝鮮鐵道之經營與連繫，確保帝國經濟與軍事利益。政治人物如大隈重信主張「日本膨脹論」、牧野伸顯宣稱經營朝鮮與臺灣是「日本的義務」。²⁷

日本輿論界對朝鮮統治稍有批判的是亞洲主義者，如《朝日新聞》記者如中野正剛，受玄洋社思想影響，批評軍人總督的武斷統治、憲兵警察的殘酷暴虐，主張以忠信篤敬、化解宿仇、加強日朝接觸、給予參政權、設立殖民地議會、以皇族取代軍人總督等措施，推動同化政策。²⁸

簡言之，上述學者、記者、政治人物是站在日本帝國主義或亞洲主義的立場，主張朝鮮、臺灣永為日本殖民地，但有必要改變殖民地統治手段，以確保民心順服。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多人都與早稻田大學有密切關係，如大隈重信是早稻田大學前身、東京專門學校的創辦人，浮田和民是早稻田大學教授、永井柳太郎是早大殖民學教授，中野正剛則是早稻田大學畢業、浮田和民的學生。

²⁷ 姜東鎮，〈日本言論界と朝鮮〉，頁 63-64；66-67；130-131。

²⁸ 姜東鎮，〈日本言論界と朝鮮〉，頁 152-161。

(二) 自由主義/民本主義者的看法

1919年三一獨立事件，引起日本知識界對殖民地問題的高度關心，有關朝鮮問題的討論大量湧現，尤其以民本主義者最為活躍。

被稱為「大正民主旗手」的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對朝鮮問題最為關切。日俄戰爭當時，吉野作造還是支持合併朝鮮的帝國青年，但1916年以後到1920年代，有了很大的轉變。吉野作造對朝鮮問題看法出現轉變，主要是受到身邊幾位朝鮮人金雨英、張德秀、白南薰等人的影響。1916年他已在《中央公論》發表過滿韓旅行見聞，批判朝鮮總督的暴虐與差別待遇。

吉野不僅與基督教青年會的東大學生金雨英、早稻田大學的張德秀、白南薰、東大金俊淵、《東亞日報》金性洙、張德俊、崔斗善等朝鮮青年接近，也關心中國革命。他聆聽過孫文的演講，與戴季陶、殷汝耕、李大釗、廖仲愷、張群等人往來，這些人名都在吉野作造日記中出現。²⁹他開始批判同化主義、鼓吹民本政治、自治主義，對朝鮮民族運動表示同情，也支持中國五四運動的反帝反封建鬥爭。

同時，民本主義者為主所組成的黎明會於1919年多次舉辦「朝鮮問題演講會」，吉野作造、福田德三公開批評朝鮮統治之惡政，要求實施憲政。³⁰吉野影響下、部分激進的東京帝大學生所組成的新人會，也在其機關報《デモクラシー》強力抨擊朝鮮合併後的憲兵政治、三一運動的殘酷鎮壓。³¹

但是，吉野作造的自由主義、民本主義主張有其極限。他並不支持朝鮮立即獨立，也不贊成廢棄與中國訂定的二十一條要求、或歸還山東省。³²

²⁹ 松尾尊允，《わが近代日本人物誌》（東京：岩波書店，2010），頁112-117。

³⁰ 姜東鎮，《日本言論界と朝鮮》，頁203-204。

³¹ 松尾尊允，《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297。

³² 松尾尊允，《民本主義と帝國主義》（東京：みすず書房，1998），頁149-159。

同樣是自由主義立場，《東洋經濟新報》的言論要比吉野作造激進許多。該報支持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族自決原理、提出滿洲放棄論、反對二十一條要求、反對出兵西伯利亞，是其一貫鮮明的主張。一次大戰後，三浦隼太郎、石橋湛山等人更加確信民族自決已成為世界大勢，三一運動之際，他們要求廢止而非改革總督政治；1921年華盛頓會議時，更主張放棄朝鮮、捨棄一切帝國主義政策，「放棄滿洲、同意臺灣獨立，放棄在中國所建立的經濟、武裝特權，與弱小國家共生」。接著又在社論中連載〈大日本主義的幻想〉一文，認為「臺灣、中國、朝鮮」並非「國防屏障」，反而是「最危險的薪草」，日本的擴張政策是亞洲和平之敵，倡議「小日本主義」。³³

然而，《東洋經濟新報》此種「對內國民主權主義、對外國際和平主義」的主張，在大眾輿論中並未獲得普遍支持，甚至只是民本主義者中的少數派，而被認為是大正民主時期「急進的自由主義」。³⁴

（三）人道主義/基督教會的看法

日本基督教團體主要有三大集團。大正時期，熊本集團代表人物是海老名正，屬於組合教會，最大據點是東京本鄉教會；橫濱集團的代表人物是植村正久，主持富士見町教會，創立東京神學社，領導日本基督教會；札幌集團代表人物是內村鑑三，屬無教會主義。³⁵

組合教會為首的海老名正，是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國家至上主義者，他曾宣稱日俄戰爭是為了神國建設的「自衛的義戰」，並積極往朝鮮傳教。但另一方面，卻又強調自由主義神學，支持立憲主義與民主主義，是典型的「對外帝國主義、對內自由主義」的主張者。³⁶ 1910年日本併吞朝鮮，組合教會認為這是「神的旨意」，是朝鮮人民的幸福，並支持同化政

³³ 松尾尊允，《民本主義と帝國主義》，頁383-430。

³⁴ 井上清、渡部徹編，《大正期の急進的自由主義：『東洋經濟新報』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72）。

³⁵ 小川圭治，《日本人とキリスト教》（東京：三省堂，1973），頁119-154。

³⁶ 太田雅夫，《増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頁84-86；126-127。

策。

但除了組合教會以外的基督教會，則對併吞朝鮮有不同主張。例如，植村正久為主的日本基督教會系統，在其《福音新報》指責總督府壓迫、反對朝鮮同化論，強調應本於人道主義的立場，體諒朝鮮民族希求獨立的心情。又如無教會主義者內村鑑三也認為，日本國雖在物質面獲取臺灣、樺太、滿洲、朝鮮等地，但在心靈面失去甚多，士氣日衰、道德日薄。³⁷

甚至，海老名所屬的組合教會內部也出現批判聲音，例如群馬縣安中教會牧師柏木義円、長老湯淺治郎，批評組合教會接受朝鮮總督府經費支援、如同「御用教會」，他們呼籲教會保有自主性。海老名的弟子吉野作造也指控朝鮮總督府武斷統治，要求教會發揮人道主義精神。三一運動之後，日本基督教各教派更是以人道主義、神前人人平等的立場，表達對朝鮮獨立運動的同情，大力批判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暴政。³⁸

（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的看法

1918年米騷動之後，日本農民運動、勞工運動、社會運動蓬勃，但社會主義者卻大多對殖民統治問題保持沉默。三一獨立事件後，只有少數社會主義者如堺利彥在社會主義刊物《新社會》上發表文章，要求建立文官總督制，既未主張放棄殖民地支配，也未觸及民族自決原則、被壓迫民族解放問題。同一時期，堺利彥、山川均等社會主義者也對中國五四運動漠不關心，在殖民地問題、民族問題上，社會主義者比他們所批評的民本主義者更加保守、冷漠。³⁹

1923年1月，荒火田寒村在《赤旗》發表了〈從無產階級所看到的朝鮮解放問題〉一文，從中可以窺出社會主義者對殖民地問題的盲點。文中大致透露「日本社會主義革命不起，則朝鮮民族解放不成」的看法，意味著

³⁷ 松尾尊允，《民本主義と帝國主義》，頁 238-240。

³⁸ 松尾尊允，《民本主義と帝國主義》，頁 251-255；265-293。

³⁹ 姜東鎮，《日本言論界と朝鮮》，頁 204-205。

日本國內的階級運動應優先於殖民地民族運動之上的態度。⁴⁰甚至1923年關東大震災後發生朝鮮人遭虐殺事件，社會主義者的反應也很冷淡。

強力挑戰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為何卻輕忽為何輕忽國際社會主義所強調的殖民地問題？

松尾尊兌認為，主要原因是俄國革命成功、日本又爆發米騷動，使得日本社會主義者們過於樂觀，幻想日本無產階級也將革命成功。⁴¹江口圭一則認為主要原因在於第三國際過於樂觀地預測無產階級革命將起於亞洲，對東亞情勢的誤判等等。⁴²這些幻覺或誤判，都使得20年代初期日本社會主義者對無產階級革命過於樂觀，相對地無暇關心殖民地問題。

1923年6月，早稻田大學教授佐野學在《改造》上發表文章，他觀察到社會主義第一期馬克斯、恩格斯強調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重要性，反對民族主義運動；但不久之後就認識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是立基於對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榨取上，因此對弱小民族運動的態度有所轉變，所以第二期社會主義強調應支持弱小民族的民族自決、民族自治、民族聯合。⁴³佐野學此論顯然是呼應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列寧與共產國際對殖民地民族運動所通過〈有關民族、殖民地問題綱領〉。⁴⁴但此時期，日本社會主義還在復甦階段、日本共產黨還在摸索階段，對於殖民地問題無暇顧及。一直要到1926、1927年以後，列寧的殖民地民族自決論陸續被翻譯引進日本，日本社會主義者才開始對殖民地民族自決論相關課題加以重視。⁴⁵

40 江口圭一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152。

41 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317。

42 江口圭一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208-209。

43 臺灣留學生們迅速翻譯佐野學此文，刊登在《臺灣》雜誌上。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臺灣》4:6 (1923.06)，頁64-75。

44 〈民族・植民地問題についてのデーゼ〉；〈民族・植民地問題についての補足デーゼ〉；レニン，〈民族・植民地問題小委員會の報告〉，收入いっだも編譯，《民族・植民地問題と共產主義 コミンテルン全資料・解題》（東京：社會評論社，1980），頁22-41。

45 石坂浩一，《近代日本の社會主義と朝鮮》（東京：社會評論社，1993），頁146-150。小山弘健編著，《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史概説》（東京：芳賀書店，1970），頁199。

整體而言，在大正民主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擴張與殖民地統治成為新聞論界與知識界探討的主要問題之一。但對殖民地問題表達關心與批判態度的，主要是亞洲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或教會人道主義者，左翼的社會主義者對殖民地問題相對冷淡、置身事外。

其次，上述亞洲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教會人道主義關心殖民地問題，其前提是希望確保殖民地，因此批判殖民地統治手段暴虐、差別待遇，要求施行善政、人道、平等、尊重等等，方能使殖民地人民永久臣服於帝國。滔滔世論中，只有少數如《東洋經濟新報》石橋湛山等人主張「小日本主義」，呼籲放棄殖民地。不過，這樣的呼聲在大正民主時期並不受重視。

再者，大正民主時期探討日本帝國對外擴張問題時，朝鮮、滿洲、中國等地，都是被關切的對象，尤其在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之後，朝鮮統治問題更是被討論的焦點。但是，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的臺灣，同樣面對殖民統治惡政，卻很少引起關注，往往是在討論朝鮮問題時附帶一提，可以說是日本輿論界、知識界的邊陲課題。

來自殖民地臺灣的留學生們，處於這樣的局面，該怎樣面對？又會採取怎樣的行動策略？

四、臺灣留學生與大正民主團體

關於大正時期臺灣人的日本留學史，已有紀旭峰的博士論文詳加梳理。⁴⁶相較於留學生政策、留學生生活等問題的討論，筆者更關心大正民主思想在臺灣學生之間的傳播途徑。

臺灣人到日本留學始於早年的「遊學」，臺灣總督府於1899年制定「官

⁴⁶ 紀旭峰，〈大正期臺灣人の「日本留學」に関する研究〉，早稻田大學大學院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費內地留學」政策，並於1902、1906年擴大適用範圍。⁴⁷ 另一方面，由於臺灣島內升學管道有限，有錢人家也紛紛將子弟送到日本留學，1920年代，臺灣留日學生人數激增。以下統計數字可以看到臺灣人與朝鮮人留學生人數逐年增加的情形，但就讀大學、高校、專門學校等高等教育的留學生，仍是少數。

表三、1919-1926臺灣與朝鮮留日學生統計

年份	臺灣		朝鮮	
	大學、高校、專門學校	總數	大學、高校、專門學校	總數
1919	36	564	58	678
1920	47	649	66	1141
1921	53	757	116	2235
1922	76	743	143	3222
1923	83	862	245	3900
1924	105	850	298	1167
1925	130	828	387	2694
1926	151	886	502	394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佐藤由美、渡部宗助，〈戰前の臺灣・朝鮮留學生に関する統計資料について〉，表一、表三、表 7-1。收入日本植民地教育史研究會編，〈植民地教育体験の記憶〉（東京：皓星社，2005），頁 85；91；96。因 1919 年以前的統計數字不全，故未列入。另，1924 年朝鮮留學生人數驟降，可能與關東大震災後殺害朝鮮人事件有關。

（一）留學生與時代氛圍

臺灣上層階級將子弟送到內地留學的風潮始於 1901 年前後，由於臺灣留學生漸多，1907 年臺灣總督府任命前國語學校教授石田新太郎擔任東京臺灣留學生之指導監督，1908 年換國語學校教授成田中敬一，1914 年由東洋協會幹事門田正經繼任。臺灣協會是臺灣留學生就學諮詢、入學指導、學費補助

⁴⁷ 佐藤由美、渡部宗助，〈戰前の臺灣・朝鮮留學生に関する統計資料について〉，收入日本植民地教育史研究會編，〈植民地教育体験の記憶〉（東京：皓星社，2005），頁 86。

的主要管道，1907年改為東洋協會。1912年建造完成的臺灣留學生宿舍「高砂寮」，也委託給東洋協會管理。⁴⁸ 但，也有許多臺灣學生是透過日本師長或友人的安排赴日留學，寄宿師長或友人家中。⁴⁹

1920年住進高砂寮的張深切，記述其在高砂寮的見聞，他說：

寄宿生裏頭，也許可以說我是最年輕者之一，他們多是活潑有為的青年，時常談論臺灣的時事問題，有的悲歌慷慨，有的韜晦不談政治，我在這裏得到了不少的常識。當時最活躍的學生，我所認識的有彭華英、范本梁、林呈礪、蔡培火、羅萬俸、陳炘、黃呈聰、蔡式穀等人，社會人士有林獻堂、蔡惠如、陳懷澄、連雅堂等，這些人可以說是臺灣黎明前的最主要領導者。

他們時常到高砂寮來訪問學生，有時候藉機聚會，向學生們講演，從事啟蒙運動。高砂寮雖然是臺灣總督府附設的留學生宿舍，名為便利學生的寄宿，其實負有蒐集情報的使命，但對學生運動卻未曾加以公然干涉。

臺灣的留學生一到東京，大抵由其學校的位置而分散，高砂寮是留學生最集中的地方，凡到東京的學生，無論時間長短，總有一兩次到這裏來寄足一下。所以這裏可以說是學生運動的最好去處，也可以說是臺灣文化運動的搖籃。⁵⁰

每年，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在帝國議會開會期間，須列席備三月中議

48 佐藤由美、渡部宗助，〈戰前の臺灣・朝鮮留學生に関する統計資料について〉，頁 86-87。楊肇嘉於 1908 年赴日留學，當時臺灣學生宿舍高砂寮尚未興建完成，楊肇嘉被安排住進臺灣協會的寄宿舍。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上）》（台北：三民書局，1977），頁 41-47。

49 例如陳逸松，就是透過日本人教師的協助赴日留學。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口述，《陳逸松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 23-40。

50 陳芳明等主編、張深切著，《張深切全集卷一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上）》（台北：文經出版社，1998），頁 172-173。

會，會期接近尾聲時，便在小石川植物園設宴招待臺灣留學生。⁵¹舉辦招待會的目的，不外召集東京臺灣留學生共同聚餐、訓話，要求臺灣學生認真學習，成為良好的日本國民。⁵²受到時代氣氛的激勵，臺灣留學生逐漸不甘於被動接受訓示，打算利用總督府招待會的場合表達留學生對臺灣政治的心聲。1919年3、4月間，明治大學法科的羅萬俤與政治經濟科的彭華英、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的吳三連商議，在主人下村宏致詞完畢後，由吳三連發難，批評臺灣總督府的同化政策、政治上的差別待遇與日本警察的高壓統治，下村宏大發雷霆，⁵³掀起臺灣留學生表達政治意見的序幕。

1920年元月，在蔡惠如等人推動下，東京臺灣留學生組成了「新民會」，其成立宗旨為「考究臺灣所應予革新之事項，以圖謀文化之向上為目的」。

表四、1920年新民會會員名單

幹部/會員	學校	姓名
會長		林獻堂
副會長		蔡惠如
幹事		黃呈聰、蔡式毅
名譽會員		陳懷澄、連雅堂
普通會員	明治大學	林呈祿、羅萬俤、蔡國麟、蔡先於、彭華英、陳全永、李烏棕、林濟川、林石樹、林朝廷、郭國基、顏春風、呂靈石、吳清水、陳添印、黃成旺、鄭松筠、陳福全、莊垂勝
	早稻田大學	王敏川、黃周、林仲輝、呂磐石、施至善、王金海、林仲澍、吳蘅秋
	中央大學	蘇維梁、吳鏡庭
	東京商科大学	吳三連、蔡珍曜、陳崑樹
	東京帝國大學	劉明朝、林攀龍
	專修大學	林伯文、柯文質、蔡敦曜
	慶應大學	陳炘、王江漢

51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頁112。

52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上）》，頁48-49。

53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晚報社，1991），頁35-39。

	東京高等師範	蔡培火、謝春木
	其他	林資彬、李君曜、蔡炳曜、莊伊若、洪元煌、黃元洪、石煥長、陳天一、楊維命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列出新民會成員名單，但人名錯誤甚多，本處出自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頁108。此時也在東京留學的張深切，認為新民會是臺灣青年會的前身，所以把此名單視為臺灣青年會的成員名單。陳芳明等主編、張深切著，《張深切全集卷一—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上）》（台北：文經出版社，1998），頁191-192。

從上述名單中可以明顯看到，1920年代初期參與留學生運動者，以明治大學與早稻田大學學生人數最多。張深切認為，新民會中明治大學學生佔多數的原因之一，是臺灣留學生就讀該校的人數最多，更重要的是明治大學的臺灣留學生幾乎都就讀法科，法科與政治本屬一系，所以法科學生對政治比較有興趣，參加人數自然較多。⁵⁴ 明治大學臺灣留學生並組成「明台會」，除舉行例會外，並於每月第一個週六舉辦討論會。⁵⁵ 早稻田大學臺灣學生也組成了「瀛士會」。

明治大學設立之初是為明治法律學校，其畢業生律師考試平均及格率近四成，獨步於各校。與其他學校相較，明治大學與中央大學畢業生從事律師、法官的比率甚高，擔任地方議會議員的人數與早稻田大學並列，從事新聞記者工作的人數也相當多，顯示該校學生對公共事務高度關心。⁵⁶

臺灣青年也對早稻田大學特別仰慕。因治警事件入獄的蔣渭水，自謂在醫學校時代曾經想要退學到日本內地，留學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後來做了醫生，但願望仍然不變，雖然沒有時間，但至少成為早大的校外生。

⁵⁴ 陳芳明等主編、張深切著，《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上）》，頁192。

⁵⁵ 明台會R.R生投，〈學校だより〉，《臺灣》4:6（1923.06.10），頁88-89。

⁵⁶ 明治大學史料センター編，《明治大學小史》（東京：學文社，2010），頁27。

1924年入獄，蔣渭水在獄中讀完了政治經濟科講義錄，達成平生的願望，自稱此次入獄如去了早稻田大學一般，而今「畢業早稻田大學了」。⁵⁷ 他還認為明治維新後日本打造了一個私立的早稻田大學，臺灣維新後，也應該要有一個臺灣人的早稻田大學。⁵⁸ 《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的重要論筆黃呈聰、黃周、黃朝琴、王敏川等人，也都是早稻田大學學生。

研究日本學生史的唐澤富太郎將日俄戰爭以來到大正民主時期青年學生對時代的回應，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對政治活動深感興趣、對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產生共鳴的「政治青年」，一類是對政界腐敗失望、轉向理想主義、超現實主義的「文學青年」。關心政治的學生在公私立大學、專門學校組織辯論社，創辦刊物，熱烈風行。大正民主時期，以明治大學學生為首，舉辦「模擬國會」活動，學生分扮朝野政黨、議員大臣，相互辯論，引發他校旁聽學習；又如東京大學新人會進行全國性規模的論辯、演說、串連，成為全國各高校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動力。⁵⁹

從本鄉的東京帝大、神田的明治大學、中央大學、日本大學到牛込區鶴卷町的早稻田大學，這些地區相鄰近且大學密集，日本、中國、朝鮮等亞洲各國學生聚宿在此，臺灣留學生也在此活動。神田青年會館、富士見町教會、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館等處，是黎明會、青年團體經常舉辦演講之處，臺灣留學生耳濡目染之餘，經常在這些地點舉辦活動，享受大正民主時期思想上的相對開放。

（二）運動團體與人脈關係

大正民主時期，立憲主義者、民本主義者、人道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儘管思想主張上有所不同，卻形成綿密交錯的運動團體與人脈關係。許多活躍一時的大學教授、政治人物都是基督徒，而社會運動又與校園、教會青年

57 雪谷，〈獄中隨筆（三）〉，《臺灣民報》61（1925.07.19），頁12。

58 渭水，〈晨鐘暮鼓〉，《臺灣民報》3：1（1925.01.01），頁24。

59 唐澤富太郎，《學生的歷史》（東京：創文社，1955），頁152-154。

關係密切。例如，自由主義者島田三郎、本鄉教會牧師海老名彈正為中心，成立了「國民作新會」，成員都是基督教徒，包括東京大學出身的小山東助、內崎作三郎，早稻田大學出身的永井柳太郎、大山郁夫等人。⁶⁰又如東京帝大學生、基督教青年會成員星島二郎創辦了《大學評論》，包括本鄉教會、富士見町教會等其他教會所屬的學生與教授們，都是該刊物的協力成員。⁶¹而海老名彈正為主的刊物《新人》、植村正久為主的刊物《福音新報》、安部磯雄為主的《六合》雜誌等等，都讓教會在言論界、思想界與政治界發揮極大影響力。

20年代東京臺灣留學生運動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青年》發刊為主，蔡培火與林呈祿是核心人物，留學生們參與其間。透過這些人士的人脈關係，可以看出整個運動的縮影。

1. 教會與政界

1920年4月，蔡培火接受植村正久牧師的洗禮，成為基督教徒。透過教會與信仰的關係，蔡培火為殖民地臺灣的自治主義運動開展出廣闊的人脈關係。透過植村正久牧師的介紹，蔡培火結識了富士見町教會長老及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貴族院議員江原素六，這兩人都虔誠基督徒。又經由田川的協助，獲得眾議院清瀨一郎、尾崎行雄、島田三郎、安部磯雄等人，貴族院阪谷芳郎、山脇玄、渡邊暢的支持。⁶²上述人士或在《臺灣青年》、《臺灣》雜誌上投稿呼應，或於帝國議會協助請願活動。

林呈祿也努力拓展人脈。他在其東京神田區三崎町寓所與阪谷芳郎所主持的「大日本和平協會」的會址相鄰，該會主要幹部川上勇常與林氏觀念頗為契合，透過這層淵源雙方漸有接觸。⁶³阪谷芳郎、川上勇也常在《臺灣青年》

⁶⁰ 太田雅夫，《增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頁126。

⁶¹ 太田雅夫，《增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頁199-207。

⁶²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頁218。

⁶³ 葉榮鐘，〈林呈祿一生忠義——紀念這位抗日運動的理論家〉，收入葉榮鐘著、李南衡編，《臺灣人物群像》（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頁108。

與《臺灣》雜誌上發表文章。

1921年4月，林獻堂、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等人與日本政界貴族院高田早苗、江原素六、眾院議員尾崎行雄、永井柳太郎、田川大吉郎、學界山本忠興、添田壽一、泉哲、教會植村正久、新聞界石川安次郎、枝松保二等24人發起成立了「玉山俱樂部」，⁶⁴可說是日本政界與言論界同情臺灣問題者的組織。臺灣青年會在春秋二季定期舉行例會，從《臺灣青年》與《臺灣》上可以看到他們邀請島田三郎、內崎作三郎、田川大吉郎、泉哲、神田正雄等政界、學界人士在例會中演講的報導。⁶⁵

2. 學界與殖民政策學者

植村正久與田川大吉郎也將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明治大學教授泉哲、早稻田大學教授內崎作三郎等介紹給蔡培火。⁶⁶

1918年12月，吉野作造與東京商科大學福田德三等民本主義知識人組成了黎明會，經常在神田青年會館舉行舉辦演講會。吉野的門生金雨英等朝鮮人也加入。臺灣留學生耳濡目染，受到思想的啟發與刺激，並進而與民本主義思想家們接觸。⁶⁷從《臺灣青年》與《臺灣》雜誌上可以看到吉野作造所寫的祝辭與文章，福田德三也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表達關心。

以吉野的學生、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學生為主組成了新人會，並歡迎朝鮮學生入會，金雨英、金俊淵都是會員。但，此時期尚無臺灣學生加入新人會。⁶⁸

1919年夏，圍繞著吉野作造為中心，對中國、朝鮮、臺灣問題有興趣的日本學生及留學生們組成了一個東亞研究團體。這個東亞研究團體與東大政治

⁶⁴ 記者，〈玉山俱樂部的創設〉，《臺灣青年》2:3（1921.04），頁55-57。

⁶⁵ 島田三郎，〈臺灣青年諸君に告ぐ〉，《臺灣青年》3:5（1921.11），日文之部，頁2-16。泉哲，〈軍備縮小に就て〉，《臺灣青年》3:5（1921.11），日文之部，頁17-23。一青年會幹事，〈臺灣青年會通信〉，《臺灣》3:3（1922.06），頁53-55。幹事，〈臺灣青年會例會〉，《臺灣》3:9（1922.12），頁64。青年會幹事，〈東京臺灣青年會春季例會狀況〉，《臺灣》4:6（1923.06.10），頁79-81。

⁶⁶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頁218。

⁶⁷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頁100。

⁶⁸ 東大新人會中唯一的臺灣人是陳逸松，他於1928年加入該會。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口述，《陳逸松回憶錄》，頁101-110。

研究室、東大綠會辯論部、東大基督教青年會都是以吉野作造為中心的團體。⁶⁹這些學生們開始學習世界語，日本學生也學習被壓迫民族的朝鮮語、中國語，體會亞洲被壓迫民族的國族主義情感，克服日本的大國意識，並展現人道主義、展現世界主義的傾向。⁷⁰臺灣留學生是否有人參與此團體，目前並未發現待相關資料。

另一方面，許多明治大學與早稻田大學教授也在《臺灣青年》與《臺灣》雜誌上發表文章，應該是就讀於這兩校的臺灣留學生努力的成果。例如，林呈祿對殖民政策學特別感興趣，經常出入早稻田大學教授永井柳太郎、明治大學教授泉哲、東京帝大教授矢內原忠雄、京都帝大山本美越乃、貴族院議員江木翼等進步學者之門。⁷¹20年代中期以後就讀於早稻田大學的楊肇嘉對政治課程從不缺課，並經常到政治學教授們的宿舍請教，如教授民眾政治的安部磯雄、教授政治機構的高橋清吾、教授殖民地統治的淺見登郎；又因對於殖民政策學甚有興趣，請教過早稻田大學的永田教授、大山郁夫教授、東京帝大的矢內原教授、明治大學的小島寬教授。⁷²在這些大學學者中，明治大學的泉哲可以說是對臺灣問題最關心者，他在臺灣留學生的刊物上最為活躍。

日本殖民政策學始於札幌農學校，最初設立時是與農政學一體，為開拓北海道而成立，之後因臺灣、樺太、滿蒙、朝鮮、南洋等農業殖民地擴張而被提倡。⁷³第一次大戰中，新渡戶稻造在東京帝國大學開設了殖民政策講義，強調「殖民是文明的傳播」，⁷⁴此時期殖民政策學者顯然是站在為日本帝國殖民擴張代言的立場。

⁶⁹ 松尾尊兌，《民本主義と帝國主義》，頁187。

⁷⁰ 松尾尊兌，《民本主義と帝國主義》，頁189。

⁷¹ 王詩琅，〈林呈祿仙生訪問紀錄〉，收入黃富三等編，《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基金會，1991），頁28。

⁷²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上）》，頁225。

⁷³ 井上勝生，〈札幌農學校と植民學の誕生—佐藤昌介を中心に〉，收入酒井哲哉等編，《「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一卷 「帝國」編成の系譜》（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12。

⁷⁴ 酒井哲哉，〈「帝國秩序」と「國際秩序」--殖民政策學における媒介の論理〉，收入酒井哲哉等編，《「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一卷 「帝國」編成の系譜》（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294-297。

殖民地臺灣留學生親近殖民政策學者，並學習吸收他們的理論，這現象看起來十分弔詭。為什麼殖民地人民會願意接受具有擴張帝國版圖、強化帝國秩序此種「準國家學」的殖民政策論？

一次大戰之後，自由主義思潮蔓延，各殖民地人民要求參政，同化主義殖民政策受到批判；又，相對於明治時期接受德國式的國家學，大正民主時期則轉換到「發現社會」的近代政治學；這些變化都衝擊日本殖民政策學者，思考如何重編帝國秩序。留學美國的泉哲，在明治大學開授殖民政策學，就是以英國式的「國協」（common wealth）作為重新建構日本帝國秩序的制度構想。東京帝大的矢內原忠雄接手新渡戶稻造教授殖民政策學，也不再侷限於殖民地領有之統治政策，而擴大到政治、經濟、社會交互作用的探討，繼而批判從屬主義、同化主義，提出自主主義殖民地政策的主張。⁷⁵

大正民主時期，殖民政策學者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批判過去的帝國殖民統治政策、同化主義，重新思考合理的帝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及適當的統治架構，此時期殖民政策學方向的調整，正是殖民地臺灣青年願意親近、並援引作為運動理論根據的重要原因。

3. 社會主義運動團體

雖然大正民主時期日本社會主義者對於殖民地問題並不關心，但受到時代思潮的吸引，殖民地留學生如朝鮮學生仍然積極與社會主義運動團體接觸，臺灣留學生亦然。

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經過1910年大逆事件後進入冬眠狀態。因1918年米騷動、大正民主運動的鼓舞，社會主義運動復甦，1920年成立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不到半年旋即被禁。明治大學學生彭華英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者密切接觸，學者山邊健太郎所保存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名冊中，記載了彭華英的名字。⁷⁶筆者另從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找到的另一份日本社會

⁷⁵ 酒井哲哉，〈「帝國秩序」と「國際秩序」--植民政策學における媒介の論理〉，頁297-304。

⁷⁶ 山邊健太郎，〈解說〉，《現代史資料22臺灣》（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頁XV。

主義同盟名冊，發現明治大學的臺灣留學生黃登洲、早稻田大學的呂磐石也是該同盟成員。⁷⁷

早稻田大學學生、民人同盟會核心成員高津正道，也是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發起人之一。1920年5月，他在校園外組成了「曉民會」，宗旨在於「研究並普及社會主義，奧援啟蒙工作與爭議事件，養成鬥士」。⁷⁸高津正道自述，曉民會人數最多時約有50人，以早大與位於目白之女子大學間的一個處所做為根據地，同志們合宿，包括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荒火田寒村、佐野學等多人陸續擔任講師進行教學。曉民會以研究為名，不只舉辦演講，也協助其他團體，忙於奧援爭議事件，會員們夢想革命已近，自詡為革命行動隊伍。⁷⁹

曉民會的一大特徵是接受朝鮮人、中國人會員，以實現「日鮮支」國際主義為目標。因此，除了中國人王樹聲、臺灣人彭華英之外，更有金若水、朴烈等許多朝鮮人會員，⁸⁰高津正道尚且被朝鮮人認為是最值得信賴的日本人。⁸¹臺灣留學生彭華英接觸曉民會，參與他們的演講與研究會宣傳活動，並與在東京的朝鮮左翼人士、中國留學生相當接近。⁸²

更早之前，彭華英還加入早稻田大學左翼學生於1919年10月所組成的團體「建設者同盟」。⁸³

1920年11月成立的コスモ俱樂部，是在日本社會主義者同盟結成的過程中所出現的思想團體，活動於1920-1923年之間，是日本社會主義者、民本主義者與朝鮮、中國留學生及民族主義者交流為主要目的的國際性組織。「コスモ」（COSMO）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之略稱，依據警視廳所作成的

77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名冊〉，收藏於日本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

78 伊藤隆，《大正期「革新」派の成立》（東京：塙書房，1978），頁105，117。

79 伊藤隆，《大正期「革新」派の成立》，頁118。

80 犬丸義一，《第一次共產黨史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93），頁117。

81 石坂浩一，《近代日本の社會主義と朝鮮》，頁158。

8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龍溪書舍復刻版，1973），頁584。以下稱《臺灣社會運動史》。

83 頁39-40。

大正10年度「特別要視察人調查」（特別要視察人狀勢調），該團體是「轄下大部份別要視察人與中國、朝鮮、臺灣等留學生中抱持激進思想者所組成，以世界人類平等親善為旨趣，真正的目的不難想像是為了宣傳反國家主義」。⁸⁴ 該俱樂部成員共76名，每月開會一次，包括社會主義中普羅派的堺利彥、山川均、高津正道等；無政府主義派的大杉榮、近藤憲二、岩佐作太郎、石川三四郎等；新人會的宮崎龍介、赤松克磨等；與民本主義者吉野作造、大山郁夫、長谷川如是閑等都是成員，還可以看到部分中國人、朝鮮人、亞洲人的名字。⁸⁵

1921年6月24日傍晚，コスモ俱樂部在神田區基督教青年會館舉辦主題為「人類愛的結合」演講會，臺灣人明治大學學生陳全永、上智大學的范本梁、朝鮮人元鐘麟、中國人馬伯援等，因發表激烈演說，彭華英與范本梁呼籲「臺灣解放」，而被命令演講中止。⁸⁶

嘉義出身的范本梁於1915年赴日求學，1920年入上智大學，開始與東京的無政府主義者往來，信仰無政府主義。⁸⁷

整體來看，大正民主時期臺灣留學生所接觸的主要是教會的人道主義者，政界的立憲主義者與亞洲主義者，言論界的自由主義者。這些人士是大正民主期言論界與思想界的主流，也因信仰與思想，崇尚平等、人道、文明、自由、民主等價值，對殖民地問題較為關心，要求改善殖民地統治方式。他們的言論與活動，對殖民地臺灣留學生具有相當吸引力；臺灣留學生利用相對開放的時代氣氛從事殖民地自治運動，自然會與這些人士親近，尋求他們的支持協助。從而可以理解，為何大正民主時期的殖民地青年與自由主義派親近，卻與激進派的社會主義者距離較遠的原因。

⁸⁴ 〈特別要視察人狀勢調 大正十年度〉，收入松尾尊允編，《續現代史資料2 社會主義沿革2》（東京：みすず書房，2004），頁76。

⁸⁵ 松尾尊允，〈吉野作造と在日朝鮮人學生〉，收入松尾尊允，《民本主義と帝國主義》（東京：みすず書房，1998），頁190-192。松尾尊允，《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311。

⁸⁶ 〈特別要視察人狀勢調 大正十年度〉，收入松尾尊允編，《續現代史資料2 社會主義沿革2》，2004，頁76。陳全永為明治大學學生，但特高的報告卻指為早稻田大學學生。

⁸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頁876。

其次，如果對照《臺灣青年》、《臺灣》雜誌上的言論主張可以發現，臺灣留學生們吸收了大正民主期的思想主流，以立憲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主張，作為爭取殖民地自治的理論依據。⁸⁸從知識傳遞的角度來看，大正期思想家與言論家提供了近代知識體系，殖民地青年將此挪用做為思想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迴過身來檢驗殖民體制的蠻橫虛偽，要求文明對待。

雖然日本社會主義者醉心於階級革命的想像、對殖民地問題疏離，但殖民地青年仍然與日本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密切接觸，如彭華英、范本梁等人。接觸社會主義思想的彭華英也在此時期開始在《臺灣青年》雜誌上發表文章，1920年8月發表的〈臺灣に婦人問題があるか〉一文，指出婦女問題與勞動問題是當時社會最緊要的議題，婦女權利的伸張、人格的解放，是人類幸福理想生活的保障；反觀東洋社會，尤其是臺灣仍未脫陋習，兩性關係大有改進之必要。⁸⁹1921年5月又發表〈社會主義之概說（上）〉，介紹俄國革命成功以來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精神與目標，國家社會主義的衰退與共產主義的興起。⁹⁰這篇文章，日後被連溫卿視為臺灣介紹社會主義的最早一篇作品。⁹¹

五、臺灣留學生的國際聯合行動

山室信一的研究指出，明治維新成功以後，日本成為中國、朝鮮、越南、印度等亞洲各國學習西方思想制度的傳播中心。同時，更因各國留學生匯聚於日本東京，提供了亞洲各地人士相會交流的機會，各種團體相繼組成。⁹²在

88 陳翠蓮，〈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頁141-170。

89 彭華英，〈臺灣に婦人問題があるか〉，《臺灣青年》1：2（1920.08.15），頁60-67。

90 彭華英，〈社會主義之概說（上）〉，《臺灣青年》2：4（1921.05.15），頁50-57。此文只有上篇，似未完成，《臺灣青年》雜誌以後也未刊出下篇，可能與1921年7月彭華英奔赴上海有關。

91 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2003再版），頁85。

92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頁350-355。

東京的臺灣留學生除了知識學習與思想傳遞之外，也開始展開與東亞地區相同命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合作。

根據日本青年學者小野容照的研究，1915年秋天成立的「新亞同盟會」，是最早組成的中國、朝鮮、臺灣留學生團體。這個團體的組成的背景，乃因反日本對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促使中國反日運動蓬勃，出現以早稻田大學李大釗為中心的留學生反對活動。對中國侵略之危機感昇高的中國留學生、希望從日本殖民統治中獨立的朝鮮學生，在「反日」的共同前提下進行合作，同樣受日本殖民支配的臺灣人留學生也加入。成立大會在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舉行，有三十多人參與，包括明治大學中國留學生黃介民、早稻田大學朝鮮留學生金綴洙是主要成員，臺灣人留學生中包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的彭華英、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的蔡國禎（蔡國珍），而這也是臺灣學生與朝鮮學生最早的合作。⁹³

1919至1920年，彭華英、范本梁等人對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團體的參與已如前述。

1921年7月，彭華英與蔡惠如兩人一起奔赴上海，因關注華盛頓會議召開與動向、試探臺灣革命之機會，受到日本警視廳當局的監視。⁹⁴ 蔡惠如與彭華英從東京到上海後，與菲律賓、印度、朝鮮民族運動者在上海大東旅館共同開會，討論華盛頓會議召開之際的對應之策，計劃派遣代表前往，進行遠東弱小民獨立的請願運動。但在7月24日的會議中，與會者因臺灣對日關係與朝鮮對日關係大異其趣，意見不同；⁹⁵ 31日的會議中，又因中國方面同志希望請願臺灣歸還中國，臺灣方面同志則希望臺灣能如比利時一般獨立成為永久中立國，看法不同；結果臺灣人方面僅決議提出請願書，未派代表赴會。⁹⁶ 8月

⁹³ 小野容照，〈殖民地朝鮮、臺灣民族運動の相互連帶にする一試論--その起源と初期變容過程を中心--〉，《史林》94：2（2011.03），頁35-68。

⁹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頁584。

⁹⁵ 大正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人獨立運動計劃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 臺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⁹⁶ 大正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獨立運動計劃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 臺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18日彭又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和田久太郎、朝鮮人、大阪のコスモ俱樂部成員聚會。⁹⁷

1924年3月彭華英、蔡炳曜等數名臺灣青年與中國社會主義者羅豁（羅志道）、朝鮮獨立運動者呂運亨、尹滋英、卓武初等人組成「平社」，臺灣人方面還有上海臺灣青年會的幹部林堯坤、許乃昌、張沐真、游金水等人，並發行刊物《平平》，批評臺灣議會運動為過時的運動。⁹⁸5月組成「臺灣自治協會」，6月又成立「台韓同志會」。⁹⁹

無政府主義者范本梁也相當活躍，1922年8月他離開東京到北京，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與當地無政府主義者往來，參與思想運動，並與台中出身的關錦輝、謝廉清、謝文達等人進行種種策劃。¹⁰⁰此時期無政府主義運動在北京大學的勢力很大，包括校長蔡元培、教員李石曾、吳稚暉都有此傾向。

¹⁰¹范本梁加入了北京無政府主義者、世界語推動者景梅九等一百九十多人所組織的「北京安社」。他並與許地山組成了無政府主義團體「新臺灣安社」，出刊機關雜誌《新臺灣》。¹⁰²

據日本警方的觀察，1924年7月創辦的《新臺灣》，主要內容在宣傳無政府主義與排日主張。該刊規模貧弱，發行經常中斷，主要由就讀於北京大學的范本梁與鄭開源等二、三人負責、不定期出刊，每回印刷300冊密送給中國學生聯合會等不同主義主張者，其費用乃是范本梁以家鄉寄來的費用在支撐。除了景梅九之外，范本梁與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羅志道（羅豁）也有深交，經常往來。¹⁰³

97 大正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人獨立運動計劃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 臺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頁68-69。

9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77-78。

99 大正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在上海一部臺灣青年學生等ノ行動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 臺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10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876。

101 曹世鉉，《清末民初無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255-256。

10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社會運動史》，頁876-877。

103 大正十五年五月十九日，〈秘密出版物「新臺灣」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 臺灣人

除了左翼團體的合作之外，右派方面也有國際留學生合作的行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

當時朝鮮人的民族自決運動乃至民族獨立運動，以及為達成此目標而進行的文化啟蒙運動，比臺灣人的運動遙遙前進。如在東京的留學生已組織數個團體，發行機關刊物，進行思想普及之宣傳，臺灣人方面漸次與之接近。《亞細亞公論》主幹柳壽泉與蔡培火、林呈祿親交，並對《亞細亞公論》頻頻投稿可以證明。尤其蔡培火曾被聘為該公論社理事，又屢屢在朝鮮人鄭泰玉所主持的《朝鮮青年》上發表意見。¹⁰⁴

《亞細亞公論》是朝鮮青年柳泰慶（柳壽泉）於1922年5月所創刊，總共發行了9期，於1923年1月停刊。該刊在編輯上具有極大突破性，同時使用了日本語、朝鮮語及中國語三種語言，雜誌封面上則用了亞細亞公論/The Asia Review/韓文三種語文，創刊號的封面上並標示了「人類主義」做為其宗旨。¹⁰⁵該刊的撰稿人有幾個特色：一、以早稻田大學有關的人士為主，包括畢業於早大的《東洋經濟新報》的三浦鍬太郎、石橋湛山；文學青年高辻秀宣、坂本哲郎；早大教授大山郁夫、永井柳太郎、佐野學、安部磯雄、杉森孝次郎、內崎作三郎等等，都是大正民主期著名的言論家、社會運動家。其中，大多數撰稿者也曾在《臺灣青年》、《臺灣》雜誌發聲，但急進自由主義者三浦鍬太郎、石橋湛山，社會主義運動家大山郁夫等人不曾在臺灣留學生的刊物上出現過。二、該刊不只是朝鮮人的刊物，可視為亞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識份子的共同發聲場所，除了朝鮮人之外，如流亡於日本的印度知識份子Rash Behari Bose；中國人戴季陶、湯鶴逸、張昌言；臺灣人蔡培火、黃

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¹⁰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頁25。

¹⁰⁵ 羅京洙，〈柳泰慶與《亞細亞公論》—東亞知識交流史的新發現〉，收入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編，《東亞的知識交流與歷史記憶》（首爾：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頁151-173。

呈聰、王敏川等等，都在該刊上發表文章。¹⁰⁶

臺灣留學生在該刊上發表的文章包括蔡培火的〈極東の平和果して如何〉（創刊號）、黃呈聰的〈臺灣の經濟的危機〉（一卷三號）、王敏川的〈希望賢明政治家之出現（漢文）〉（第二卷新年號），並且於創刊號上以12頁的篇幅完整刊載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¹⁰⁷另外，也有署名「臺灣青年」者撰寫〈臺灣に於ける言論壓迫を内地朝野諸賢に訴ふ〉一文，抗議臺灣總督府當局對《臺灣青年》雜誌的嚴格取締。¹⁰⁸《亞細亞公論》顯然是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各殖民地人民的發言場域。

同時，臺灣留學生所主辦的《臺灣》雜誌也自1922年10月起開始刊登《亞細亞公論》的廣告，推崇它是「東亞言論思想界的最高權威」。¹⁰⁹透過《亞細亞公論》此一刊物，可以看到1920年代亞洲殖民地青年的相互奧援、橫向合作。

從上述活動可以看到，大正民主時期的青年運動充滿跨國合作性格，尤其是社會主義、左派運動強調國際主義，吸引各國青年相互奧援、合作。在東京的臺灣青年，不論左派、右派，都順應這股潮流，努力結交各國人士，擴大合作對象，爭取殖民地解放的機會。

六、結論

透過以上討論，筆者試圖歸納幾點看法：

首先，關於大正民主時期的特性與評價問題。大正民主期是日本明治維新、國權強盛以來，相對而言較為自由開放、「發現社會」的時代。固然有日本學者認為大正民主雖未成功締造日本成為民主社會，卻是戰後日本民主

¹⁰⁶ 後藤乾一等編集、解題，《亞細亞公論・大東公論》復刻版（東京：龍溪書舍，2008）。

¹⁰⁷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亞細亞公論》創刊號（1922.05），頁81-92。

¹⁰⁸ 臺灣青年，〈臺灣に於ける言論壓迫を内地朝野諸賢に訴ふ〉，《亞細亞公論》創刊號（1922.05），頁76-81。

¹⁰⁹ 廣告頁，《臺灣》3:8（1922.11）。廣告頁，《臺灣》3:9（1922.12）。封底，《臺灣》4:2（1923.02）。最後一次廣告刊登時於1923年2月，其實《亞細亞公論》已於該年1月停刊。

政治再生、民主體制建立的根基。¹¹⁰也有學者給予號稱「大正民主旗手」的吉野作造極高評價，認為已是當時條件下、除了地下化的共產黨以外、最進步的言論主張。¹¹¹但實際上，大正民主所稱的「民本主義」並非「民主主義」，¹¹²而是對日本帝國架構與天皇體制的妥協，是折衷的自由、有限的民主主張。例如同情朝鮮與中國的吉野，並不支持朝鮮獨立運動、也不放棄對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如此溫和的自由主義吉野作造，是大正民主期的代表人物。雖然這個時期也有如三浦鍬太郎、石橋湛山等人強力批判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提倡「小日本主義」、主張「殖民地放棄論」，但這樣的看法並非大正民主的思想主流。

其次，為何1920年代臺灣留學生在人脈上與知識資源上趨於保守、接近右派人士？

大正民主期的主流思想是立憲主義、亞洲主義者、溫和自由主義、基督教人道主義，他們關心殖民地統治問題，對帝國的同化主義、武斷統治有所批評。但，這些關心的前提是希望確保殖民地永久為日本領有，只是呼籲改善殖民地統治、人道對待。同時，此時期自由主義思潮衝擊到殖民政策學，過去具有強烈國家學色彩的殖民政政策學開始出現修正，英國式的國協統治型態被認為是較文明的模式，而成為殖民政策學主流。殖民政策學者如泉哲、矢內原忠雄依此作為重新編製帝國秩序的構想，要求給予殖民地自治、自主等緩衝空間，以保帝國殖民地之長存。

雖然20年代日本社會主義者開始恢復活動，但一方面仍在摸索與重組的狀態，無暇顧及殖民地問題。日本社會主義者一方面迷信於俄國革命成功、日本米騷動之後的社會運動蓬勃，幻想著無產階級革命將實現，對於殖民地民族運動並不感興趣。如此情況下，有關殖民地問題的言論場域幾乎由前述右派主導，殖民地青年欲尋求殖民母國進步人士的協助，自然認為自由主義

110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頁34。

111 松尾尊兌，《わが近代日本人物誌》，頁134。

112 太田雅夫，《増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頁32-36。

者的團體對此問題較為關心，其論述也較為友善、親近，從而可以理解為何臺灣留學生政治運動主要結交的對象是立憲主義者為主的政界人士、人道主義者為主的教會人士、自由主義為主的殖民政策學者。

再者，從知識傳播的角度來看，臺灣留學生從事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所提出的論述與主張，大抵不脫離立憲主義、人道主義、文明殖民說，大量吸收、複製殖民母國的主流思潮，並將轉化成為反抗工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要求改民地殖民地統治。

直到1920年代後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日益活躍，並呼應共產國際的殖民地民族自決論，開始重視殖民地問題。跟隨大正思潮的轉變，臺灣留學生政治運動也愈發左傾，並影響到臺灣的政治運動團體的分合。日治中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發展，幾乎是日本思想界與運動界的延長，從自由主義往共產主義轉變的情況如出一轍。

最後，筆者要指出，日本言論界批判日本帝國擴張，關切的問題是朝鮮、滿洲、中國，殖民地臺灣只是大正民主時期言論界的邊陲。大正民言論界活躍人士吉野作造、大山郁夫，急進自由主義者石橋湛山等人對朝鮮問題頻頻發言，相對之下，臺灣問題受到的關注很有限。面對這樣不利的環境，臺灣留學生採取怎樣的行動策略？

從前文討論中可以看到，臺灣留學生不分左右派，儘可能擴大聯合對象，左派走國際主義路線，與日本、朝鮮、菲律賓、印度人士互動，更與朝鮮、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攜手；右派也與朝鮮人合作辦刊物、相互聲援。20年代反殖民運動中的跨國合作情形，超乎想像，值得進一步研究。

附錄一、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介紹議員名單

請願回數	提出年月	介紹議員	連署人數	結果
1	1921.01.30	貴族院 江原素六 眾議院 田川大吉郎	林獻堂以下 187 名	兩院均不採擇
2	1922.02.16	貴族院 江原素六 眾議院 田川大吉郎 清瀨一郎	林獻堂以下 512 名	兩院均不採擇
3	1923.02.22	貴族院 山脇玄 眾議院 田川大吉郎 清瀨一郎	蔡惠如以下 278 名	兩院均不採擇
4	1924.01.30	貴族院 山脇玄 眾議院 田川大吉郎 清瀨一郎	林獻堂以下 71 名	因眾院解散、 貴院停會未上 呈
5	1924.07.05	貴族院 山脇玄 眾議院 清瀨一郎 神田正雄	蔡培火以下 233 名	貴院未上呈、 眾院審議議未 了
6	1925.02.17	貴族院 山脇玄 眾議院 渡邊暢 清瀨一郎 神田正雄	林獻堂以下 5782名	貴院未上呈、 眾院審議議未 了
7	1926.02.09	貴族院 渡邊暢 眾議院 清瀨一郎 神田正雄 中野寅吉	林獻堂以下 1990名	貴院未上呈、 眾院不採擇
8	1927.01.19	貴族院 渡邊暢 眾議院 清瀨一郎 神田正雄	林獻堂以下 2470名	貴院未上呈、 眾院審議議未 了
9	1928.04.25	貴族院 渡邊暢 眾議院 清瀨一郎 神田正雄	林獻堂以下 2050名(眾院)	貴院未上呈、 眾院審議議未 了
10	1929.02.16	貴族院 渡邊暢 眾議院 神田正雄 土井樵太	林獻堂以下 1932名	貴院不採擇、 眾院審議議未 了
11	1930.04.28	貴族院 渡邊暢 眾議院 田川大吉郎 清瀨一郎	林獻堂以下 1314名	貴院不明、 眾院不採擇
12	1931..02.12	貴族院 渡邊暢 眾議院 田川大吉郎 清瀨一郎	蔡培火以下 1381名	貴院不採擇、 眾院審議議未 了

13	1932.06.03	貴族院 眾議院	渡邊暢 清瀨一郎 清水留三郎	林獻堂以下 2684名	貴院不採擇、 眾院審議議未 了
14	1933.01.31	貴族院 眾議院	渡邊暢 清瀨一郎 清水留三郎	林獻堂以下 1859名(眾院)	兩院均不採擇
15	1934.02.06	貴族院 眾議院	渡邊暢 清瀨一郎 清水留三郎	林獻堂以下 1070名	兩院均不採擇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龍溪書舍復刻版，1973)，頁 327-330。

附錄二、日本人在《臺灣青年》與《臺灣》雜誌投稿名單

為《臺灣青年》撰稿的日本教會人士				
期刊名	頭銜	作者	篇名	卷期
臺灣青年	東京神學社校長牧師	植村正久	臺灣の青年に望む	一：一
	東京同志社大學總長	海老名彈正	臺灣人の實力とその使命	一：二
			啟發臺灣文化之方針	一：五
	東京帝大基督教青年會主事	藤田逸男	文化と青年	一：四
立教大學校長	元田作之進	世界に於ける學生の移動	二：二	

為《臺灣青年》、《臺灣》撰稿的日本政界、新聞界人物				
期刊名	頭銜	作者	篇名	卷期
臺灣青年	大日本和平協會副會長	阪谷芳郎	臺灣青年の發刊を祝	一：一
	大日本和平協會幹事	川上勇	世界における平和運動の經過	二：一
			國際聯盟	二：二
	貴族院議員	永田秀次郎	所感	一：一
		江木翼	臺灣統治の第一義	三：四
		江原素六	平和建設のために	三：六
	眾議院議員	永井柳太郎	臺灣的文化と臺灣人の使命	一：三
			近代政治の理想	三：二
		田川大吉郎	歐米の思潮と羅馬字	一：三
			臺灣の議論に關する回想	二：三
			下達せる教育	三：三
		島田三郎	下達せる教育	三：四
			內台融和の根本問題	一：四
	祝創刊一週年		三：一	
	臺灣總督府總務長	下村宏	臺灣青年諸君に告ぐ	三：五
			布るべき自治制度について	一：二
			非理法權天	三：一
無	佐野袈裟美	文明の進歩と社會の進歩	二：五	

	東京朝日新聞囑託	山本曾太郎	宗教的植民政策論(上)	二：五	
			宗教的植民政策	三：一	
			灣米論	三：二	
《臺灣》	貴族院議員	古島一雄	中日國交上宜先變易日本之態度	三：四	
			江木翼	植民地を擁護せよ	三：五
				保甲制度に就て	四：七
	保甲制度に就て	四：八			
	山脇玄	國家の急務	四：五		
		田川大吉郎	ラウンドテーブルの話	三：一	
			臺灣青年諸君に寄す	四：二	
	尾崎行雄	我國内情之回顧	三：一		
		島田三郎	宜改革統治臺灣之方針	三：五	
			臺灣の政治に就て	三：八	
	永井柳太郎	植民政策のに就て	三：七		
	前參謀本部編修官	長瀬鳳輔	民族運動の脅威	三：一	
	法學博士	下村宏	歐米漫遊の所感	三：二	
			普選と鮮人問題	五：二	
	東京朝日新聞中國部部長	神田正雄	王化的に臺灣を統治せよ	三：四	
日本に於ける世界的地位			三：八		
臺灣を觀て來て			四：六		
臺灣視察談			四：七		
東京朝日新聞外報部部長	米田實	民族主義と人種平等	三：六		
	安岡正篤	東洋植民政策之光明	三：四		
陸軍教授	阿部莊二	法の威力と遵法の經神	三：七		
大日本和平協會幹事	川上勇	留學生と社交	三：八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長	竹内友治郎	臺灣警察行政の衝に立ちて	四：二		

為《臺灣青年》、《臺灣》撰稿的大學教授與文化界人士				
期刊名	頭銜	作者	篇名	卷期
臺灣青年	東京帝大教授	吉野作造	祝辭	一：一
			愛爾蘭問題に就いて	四：二
		姉崎正治	内地の延長ということ	三：一
	早稻田大學教授	安部磯雄	臺灣の教育問題に就て	一：四
帆足理一郎		價值觀の逆倒	二：四	

		北澤新次郎	勞動運動と新文化の創造	二：五
		山本興忠	臺灣の現在及將來	三：二
		内崎作三郎	日本國民性と臺灣統治政策	三：四
		五來欣造	將來の植民政策	四：一
	明治大學校長	木下友三郎	臺灣人並内地人に對する希望	一：一
	明治大學教授	泉哲	臺灣島民に告ぐ	一：一
			臺灣自治制を評す	一：三
			民族自決の真意	二：四
			太平洋會議とは何ぞや	三：二
			軍備縮小に就て	三：五
	東京高師教授	和田猪三郎	所感	一：二
			文明の建設と吾等日本人	三：六
			文明の建設と吾等日本人	四：一
		友枝高彦	文化問題として内地と臺灣との關係を論ず	一：五
			新しき世界の秩序と新しき道德	四：二
	慶應義塾幹事	石田新太郎	臺灣先覺者に望む	三：一
	東京清和女塾塾長	山東泰	東京へ勉學に出て來る臺灣の若き御婦人及びその親達に	一：二
	陸軍砲工學校教授	刈屋他人次郎	二月に五回日曜日ある年	一：五
	文學士	後藤朝太郎	臺灣文化の爲めに	一：二
	法學博士	平沼淑郎	臺灣人と施政方針	二：一
		船尾榮太郎	文化の救援	三：五
	法學博士	中島玉吾	長子相續法改正論	四：一
臺灣	東京帝大教授	河津暹	自治主義と同化主義	四：三
		末弘岩太郎	立法の極限に關する多少の考察	四：三
	早稻田大學教授	安部磯雄	國際平和の心理的觀察	三：一
			自治の訓練を與へよ	四：三
		武田豐四郎	新文化のガンデイ	三：五
	内崎作三郎	東洋文化に於ける臺灣	三：九	

			の位地	
		佐野學	將來の植民政策について	四：一
			臺灣議會の設置を助けよ	四：三
		杉森孝次郎	臺灣の近い將來に對する私の希望	四：三
		帆足理一郎	臺灣議會設立案に就て	四：三
			民眾的文化の哲學的根據	五：二
	明治大學教授	泉哲	華盛頓會議の效績	三：二
			ゼノア會議の效績	三：四
			少数民族の保護と民族自決	三：九
			植民地に於ける立法機關に就て	四：四
			臺灣の機來	五：一
	慶應義塾大學教授	田中萃一郎	相互理解	三：三
		清水靜文	經濟上より見たる英米の將來	三：四
		占部百太郎	英國の植民政策	三：六
		松岡正男	臺灣を顧みて	四：七
	文學博士	三宅雪嶺	文化のナポレオン	三：三
			臺灣へか内地へか	三：七
			臺灣議會の問題	四：六
	前台北師範學校校長	太田秀穗	新附民族に對する内地人の心理變化を望む	三：六
	法學博士	小林丑三郎	臺灣の財政自治	四：三
			臺灣の財政自治	四：四
	辯護士	布施辰治	臺灣統治問題所感	五：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臺灣青年》、《臺灣》雜誌。

引用書目

一青年會幹事

1922 〈臺灣青年會通信〉，《臺灣》3（3）：53-55。

いいだもも編譯

1980 《民族・植民地問題と共產主義 コミンテルン全資料・解題》。東京：社會評論社。

三谷太一郎

1974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東京：中央公論社。

小川圭治

1973 《日本人とキリスト教》。東京：三省堂。

小山弘健編著

1970 《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史概説》。東京：芳賀書店。

小野容照

2011 〈植民地朝鮮、臺灣民族運動の相互連帯にする一試論--その起源と初期變容過程を中心に--〉，《史林》94（2）：35-68。

川口武彦

1983 《日本マルクス主義の源流—堺利彦と山川均》。東京：ありえず書房。

山室信一

2003 《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

山邊健太郎解説

1971 《現代史資料22臺灣》。東京：みすず書房。

太田雅夫

1990 《増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知識人の思想と運動》。東京：新泉社。

生松敬三

1971 《大正期の思想と文化》。東京：青木書店。

井上清、渡部徹編

- 1972 《大正期の急進的自由主義：『東洋經濟新報』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井上勝生
- 2006 〈札幌農學校と植民學の誕生—佐藤昌介を中心に〉，收入酒井哲哉等編，《「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一卷「帝國」編成の系譜》。東京：岩波書店。
- 犬丸義一
- 1993 《第一次共產黨史研究》。東京：青木書店。
- 石坂浩一
- 1993 《近代日本の社會主義と朝鮮》。東京：社會評論社。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 1973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東京，龍溪書舍復刻版。
- 江口圭一等
- 1976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學生社。
- 成田龍一
- 2010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岩波書店。
- 伊藤隆
- 1978 《大正期「革新」派の成立》。東京：塙書房。
- 坂野潤治著、鍾淑敏譯
- 2008 《近代日本政治史》。台北：五南書局。
- 佐野學
- 1923 〈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臺灣》4(6)：64-75。
- 佐藤由美、渡部宗助
- 2005 〈戦前の臺灣・朝鮮留學生に關する統計資料について〉，收入日本植民地教育史研究會編，《植民地教育體驗の記憶》。東京：皓星社。
-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記
- 1991 《吳三連回憶錄》。台北：自立晚報社。
- 金原左門

- 1967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社會的形成》。東京：青木書店。
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口述
- 1994 《陳逸松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
松尾尊兌
- 1974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岩波書店。
1998 《民本主義と帝國主義》。東京：みすず書房。
2010 《わが近代日本人物誌》。東京：岩波書店。
松尾尊兌編
- 2004 《續現代史資料2 社會主義沿革2》。東京：みすず書房。
長田正民
- 1994 〈大正民主潮流與臺灣：石橋湛山、吉野作造、田川大吉郎〉，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明台會R.R生投
- 1923 〈學校だより〉，《臺灣》4（6）：88-89。
- 明治大學史料センター編
- 2010 《明治大學小史》。東京：學文社。
-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
- 1994 《日本近代政治史第四卷》。台北：桂冠出版公司。
- 青年會幹事
- 1923 〈東京臺灣青年會春季例會狀況〉，《臺灣》4（6）：79-81。
- 泉哲
- 1921 〈軍備縮小に就て〉，《臺灣青年》3（5）：17-23。
- 姜東鎮
- 1984 《日本言論界と朝鮮》。東京：法政大學出版會。
- 紀旭峰
- 2010 〈大正期臺灣人の「日本留學」に関する研究〉，早稻田大學大學院アジア太平洋研究科博士學位論文。
- 酒井哲哉
- 2006 〈「帝國秩序」と「國際秩序」--植民政策學における媒介の論理〉，收

入酒井哲哉等編，《「帝國」日本の學知 第一卷「帝國」編成の系譜》。東京：岩波書店。

島田三郎

1921 〈臺灣青年諸君に告ぐ〉，《臺灣青年》3(5)：2-16。

記者

1921 〈玉山俱樂部の創設〉，《臺灣青年》2(3)：55-57。

連溫卿

2003 《臺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

曹世鉉

2003 《清末民初無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陳芳明等主編、張深切著

1998 《張深切全集卷一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上）》。台北：文經出版社，1998。

陳翠蓮

2003 〈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18：141-170。

雪谷(蔣渭水)

1925 〈獄中隨筆(三)〉，《臺灣民報》61：11-13。

渭水

1925 〈晨鐘暮鼓〉，《臺灣民報》3(1)：24。

黃自進

1995 《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黃富三等編

1991 《近現代臺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基金會。

彭華英

1920 〈臺灣に婦人問題があるか〉，《臺灣青年》1(2)：60-67。

1921 〈社會主義之概說（上）〉，《臺灣青年》2(4)：50-57。

幹事

1922 〈臺灣青年會例會〉，《臺灣》3(9)：64。

楊肇嘉

1977 《楊肇嘉回憶錄(上)》。台北：三民書局。

葉榮鐘

1985 《臺灣人物群像》。台北：帕米爾書店。

2000 《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台中：晨星出版社。

榮澤幸二

1981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政治思想》。東京：研文社。

潘柏均

2008 〈大正民主思潮與日治時期的臺灣政治運動—以泉哲及田川大吉郎為中心〉，輔仁大學日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名冊〉，日本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藏。

〈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人獨立運動計劃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 雜件 臺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獨立運動計劃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 雜件 臺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臺灣人獨立運動計劃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 臺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在上海一部臺灣青年學生等ノ行動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 臺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秘密出版物「新臺灣」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 臺灣人ノ部》，4,3,2,2-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Taisho Democracy and Taiwa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Tsui-Lien Chen

Abstract

There is a general viewpoint that Taiwanese' modern political movement launched in 1920s was affected by the wave of Taisho Democracy. However,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aisho Democracy"? What ideological trend spread in this period? How did it affect Taiwanese anti- colonial movement? There are few research results in related topic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various thought trends in Taisho Democracy period, and discovers that the mainstream was a half-way liberalism and limited democracy which gave way to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the emperor system. Strong critics on imperialism and expansion policy were regarded as radical. The conservative so called right wing, cared about the colonial questions and urged to improve colonial rule for keeping empire's territories. On the contrary, the socialist didn't concern with colony topics attributed to the wrong judgment about succes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rise of a mass movement in Japan, and believed that class revolution would be realized. Under this situation, Taiwanese students closed to the right-wing liberals and obtained ideological resources from them.

Meanwhile, in Taisho Democratic period, the mass media criticized colonial oppression, focused on Korea, Manchuria and China, an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aiwan. The strategy from Taiwanese students was to maximize the cooperative objects. The left-wing chose internationalist route, interacted with Japanese, Koreans,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Indians in Asia, especially organized groups with anarchists, socialists from Korea and China. The right-wing also cooperated with the Koreans for publications. The trans-nation cooperative movements in 1920s are unimaginable and worthy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Taisho Democracy, Taiwa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Democracy, Socialism, Communism.

